

■ 陆定一对新闻工作者素质的洞见与局限

——学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有感

2005-11-28

作者： 吴飞

关键词： 陆定一 延安整风 思想素质 党性 | 阅读：680次 |

[内容摘要] 延安整风运动，从本质意义上说是思想整风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整风，来强化党员的党性，改造世界观；反对政治上的自由行动，组织上的自成系统；强调教条主义的危害，提醒全党要理论联系实际。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深刻领会了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这次整风运动的核心意义所在，对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通过整风改正思想作风不符合共产党的要求，放弃他们的新闻观念中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成份，培养自由的无产阶级新闻观。

[关键词] 陆定一 延安整风 思想素质 党性

从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的发展看，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是全面整理时期。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一种新的新闻宣传理论体系诞生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体系。而新闻的理论的建立和落实是需要掌握这一理论体系的人来完成的，因此对新闻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指导思想的整风，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必然的议题。后文我们就透过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以下简称《观点》）[1] 来分析党对新闻工作者素质的基本观点。

一、延安整风的基本背景

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毛泽东发起和组织的这次整风的真正意图。包括博古在内的党的高级新闻工作者也没有真正领悟到毛泽东通过改造党报来改造党的精神所在。其实对于这一段历史，今天的史学家们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全清晰线索，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尤其是延安的社会现实情况的初步梳理，来追寻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展这一次对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文化意识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整风运动：

一）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但毛泽东的工作并不是得心应手。皖南事变导致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毛泽东认识到根本的原因，在于项英等人“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的革命实际。因此，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就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主张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2]在皖南事变过后不久，毛泽东还公开批评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的研究上”，“言必称希腊”，“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3]毛泽东的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就是那些赴过苏、留过洋，长于引经据典的领导人，尤其是留苏人员。这些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却非常之大”，1944年整风临近尾声时，康生曾经公开讲过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是搞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4]

二）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有了大片的解放区，虽然国共合作抗日是当时的共产党的主要工作任务，但至少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在未来的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会成为主导力量，完全有可能取得革命的主导权（尽管他当时不可能想到后来局势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因此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自然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能不能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不充分利用自己控制的传播媒介这种有效的宣传工具是不可思议的。而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非常熟悉中国农村的情况，在延安这片根据地里，他运筹帷幄，游刃有余，他对新闻宣传鼓动工作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他除了需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外（枪杆子），还需要的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笔杆子队伍，而不是书生们办的同仁报，更不希望自己出钱办的报纸成天发牢骚、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他需要通过报纸来指导实际工作。这从他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5]

三）那么当时我们共产党的党报能不能做到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呢？显然没有。抗战开始前后，毛泽东已接连写了《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和小册子，但都没有得到负责理论报刊宣传工作的领导人的足够重视。《新华日报》竟拒绝发表他的《论持久战》！正如《解放日报》在1942年4月1日在《致读者》的改版社论中承认的那样，“应该说，解放日报没有能够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的，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事实上，如果我们从1941年、1942年的《解放日报》的版面上安排的内容看，很容易看出当时党报上宣传国际的东西占了相当的比重，而对于根据地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jin 文章 jin 动态

SEARCH >>

■ 上一篇 PREVIOUS

MORE >>

-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 韩鸿 |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下一篇 NEXT

MORE >>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 罗晓娜 | 2006-05-29

一、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 动态 NEWS

MORE >>

-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的内容报道量相当少。更严重的是《解放日报》往往“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6]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对一些重要的事件，我们党的喉舌并没有统一的口径。如皖南事变发生后，宣传口径就不统一，这给人一种共产党内部不团结的印象。所以，毛泽东对当时党报的表现非常不满意。他抱怨说，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八路军，我们不宣传，靠谁宣传？

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和办报人员思想作风不符合共产党的要求，他们的新闻观念还带有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成份，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局势发展进程也没有毛泽东看得那么清楚。个别知识分子干部在报纸、刊物、墙报上发表文章、漫画，揭露延安的所谓“阴暗面”。这些作品有的是由于环境的不适而发泄牢骚和不满，有的是由于感情的差异而讽刺、挖苦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还有的则是由于立场的不同而攻击党的领导、否定延安。他们不分延安与西安、成绩与缺点，哪一个主流哪一个支流，一概否定，一概批判。诚如陆定一在《观点》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甚至是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于是，“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斗争就此开始了。

五)但由于延安的整风运动是从高层干部的整风开始的，一般干部对此并不理解，党报的领导和一般的编辑记者们并没有比一般干部对整风运动有更深入的认识。对此，《解放日报》在《致读者》的社论中也略有提及，该社论写道：“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尽其应该的责任。一方面，党报在这个时期没有能够成为这个巨大的工作的鼓手和先锋；另一方面，在党报本身还未尽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余毒。”典型的表现是《鲁忠才长征记》这一由毛泽东亲自撰写按语的文章，党报居然分二次刊发，而且位置也不突出（发在第二版）。即使到今天，在所谓的以受众为中心的今天，这样的情况发生大概也是不可能被容忍的。

六)另外，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形势很紧张，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丁玲的《三八有感》都出现在这段时间里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胡宗南包围了延安；另一方面显然中央内部存在不团结的因素。在政治和军事形势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自然明白需要一个稳定团结的领导集团形象和一支听话的宣传队伍。如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召开改版座谈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骤，不能成功。”事实上，博古乃一介书生，对毛泽东决非言听计从；另外国民党将王实味、包括丁玲等的文章汇编成册，作为反共宣传材料[7]，对树立我们党和军队的形象不利。3月31日毛泽东的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表明，整风的风向发生了变化：早期还存在的杂文已不行了，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已表明中央要反对放暗箭，反对冷嘲热讽。他说：

“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总体看来，延安整风是因为当时在全党，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路线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清理，还没有完全认识产生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同时抗战后党内吸收了一大批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其中一些人思想入党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新闻队伍中情况也是一样的。[8]

二、 陆定一对于党的新闻工作者素质的洞见

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理论作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合，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9] 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是建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党所领导的新闻宣传事业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整顿的基础上完成的，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则是这次整风运动的最大的成果之一。我们知识，当时在延安工作的报刊工作者，大多数是抗战以后参加革命的青年人，有的是从国外和国统区奔赴延安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并没有充分理解战时农村分散环境下党报的特性和任务，甚至有人机械地搬用国内外大报的具体做法，追求“城市化”和“正规化”[10]。在这一文章中，陆定一对一些“书生办报”的错误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作风进行一次深入的清算，就党的新闻工作的素质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陆定一在《观点》一文中表示，传统的新闻学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在陆定一看来，“传统的新闻学”都是不老实的，是唯心论的。因此陆定一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闻学观点。陆定一在文章中指出：“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他据此下出了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即，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陆定一指出，唯心论与唯物论在新闻学理论中的一条明确的界限，就是是否主张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际中真正尊重事实。所以他强调“事实与新闻政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一定要认识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

陆定一同志指出：“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它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它把“事实与政治的关系，头足颠倒过来”，而“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应该说陆定一的这一观点，是相当正确的，与一些人将“政治性”提高到第一位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 事实求是的工作作风

陆定一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必须具备的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的观点，但又指出这是不够的，因为这五要素还不能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还必须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才能写出真实的新闻。他强调，记者报道新闻必须亲自到发生事件的地方去，要亲自参与这些事实，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仅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实的真实，尤其要做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

强调新闻工作者要事实求是，这一理念陆定一一生都没有改变，解放后，他多次指出，“写新闻一定要事实求是，就是真实”，“办报，搞来搞去就这一条：真实、讲理、而且有事实”。“1942年我在延安办报，有两条主要经验：一条就是新闻要真实。第二条就是要依靠党的领导”，“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违反真实性，新闻就失去生命，写不真实新闻的记者，随之也会失去‘生命’。党和人民怎会相信说假话、写假新闻的记者呢？真实是记者必须遵守的起码的职业道德。”[11]

三) 旗帜鲜明的党性原则

所谓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阶级斗争发展到高层次的必要产物。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党都要借助各种手段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从而体现出自己的倾向性、阶级性和党派性。从新闻史的角度看，最早提出党性这一概念的是列宁。他从哲学的党性入手，指出“唯物主义本身所谓党性，要求对事变作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的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2] 后来，他把这一概念移用到新闻工作上，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的整部机器的螺丝钉，因此，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服从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个人而写作，不能容许超人的、无党性的作者。一般认为，新闻的党性原则的内涵包括：1、以科学的世界观观察世界，对客观事件作出科学的解释；2、正确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3、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4、坚持真理，坚持真实性，不说假话；5、坚定地同一切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想进行斗争，而不是退缩和调和；6、服从党的组织领导，具有组织纪律性。[13] 这些观点在陆定一的《观点》一文中都得到具体的分析。

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陆定一指出：“记者是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真理的卫士，是建设新生活的战士，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新闻记者的岗位是，生活在群众中，战斗在第一线。”在《观点》一文中，陆定一强调，党报工作者不能像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那样，自称为“无冕之王”，而是老老实实自称为公仆，是党和人民这个大集体的公仆。他指出：“人民是记者们最珍贵的主人，新闻记者应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在1946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对这一观点作了更清晰的阐述，他说，记者有两种：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他指出：记者应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人民是谁？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一切爱国分子。他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主人。[14]

三、两点不足之处

陆定一在1943年9月1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观点》一文，确实是“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扛鼎之作”[15]。他对新闻工作者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闻记者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应该具有政治家的胸怀、眼光和气魄，善于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辨别真假，判断是非。”应该说，他的观点是科学的、真诚的。不过诚如童兵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延安整风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党报理论尚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对于党报的民主监督功能认识不足，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很少。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强调后者而对于批评则重视不够，且对于批评者的态度又责之过严，令人有所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去做。第二，由于向苏联学习中的片面性，致使新闻宣传中出现一些僵化死板的做法。……这就给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造成了隐患。

[16] 其实这些不足在陆定一的文章以及由他主持的《解放日报》的工作实践都有体现。我认为，陆定一对新闻工作者素质的观点尚存在如下不足之处：

其一，忽视了新闻工作者的批判性意识

恩格斯指出新闻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而不是一种置于两者之外的独立力量，但同时，恩格斯还强调要保证新闻的“形式上的独立”，这样新闻便具有一种抵制错误思想路线和思潮的能力，使之不至于成为某一权力集团为所欲为的工具。[17] 关于党的报刊对待党的态度，恩格斯提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同时，《社会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18] 他说：党“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而这种刊物是肯定要出现的，不过，如果你们不能使它一开始就在你们的道义下问世，而不是在违背你们的意志的反对你们的情况下出现，那就更好。”他还认为，如果报刊“国家化”走得太远，会产生很大的缺点。因此“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政策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19] 他甚至还强调：“要使人们不要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

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显然恩格斯并不赞成把党的报纸都变成党的机关报，即使是党的机关报，也应该有对党的领导进行批评的权利。

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在陆定一的文章得到体现，也显然没有引起党的领导人的注意。[20] 1942年8月8日，陆定一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的总编辑。9月5日他在编委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强调报纸对于政策问题的宣传，必须经常向中央请示报告。他指示以后凡是重要新闻，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必须与中央商量。不能闹一字一句的独立性。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这一方面的认识我们还可以从彭真于1947年在《改造我们的党报》中看得更清楚，彭真指出：“报纸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代表党讲话的，必须是能够代表党的。”“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必须是对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谁还敢发表批评性的东西呢？我们最后见到的批评性文字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21]。很快王就因为这些文字吃尽了苦头，并最终掉了脑袋。不允许批评性的东西，事实证明，严重束缚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手脚，极不利于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限制直到1956年的《人民日报》的改版才有所改变。

其二，忽视了新闻工作者独立思考的精神

在《观点》一文中，陆定一指出：“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应知我们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们的工作，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为“党报工作人员对于党的每一个工作部门，对于各种实际工作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而应该去做公仆，应该恭勤的态度。”[22] 所以“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要打下长期事业心。”[23] 这些话当然都很对，不过我认为，新闻工作要想真的发现真理，揭露真相，最重要的是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不上唯上品质。可惜这些观点并没有在陆定一的《观点》中得到体现。他一再强调的是新闻工作者不能有任何的独立性。

当然陆定一的思想是与当然的整风形势是一致的。中共在整风时期强调党的报刊要保持鲜明的党派意识，在思想言论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例如1942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111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等，不能说发表这样的新闻没有党派意识，但因为不符合当时党中央的策略和斗争原则而受到批评。对此毛泽东指出：“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要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24]

为了在组织上保障党的观念上的加强，党对党报的改造花了大量的心血，一方面要求用党性的原则改造党报的新闻工作人员，清理整顿党报工作队伍。另一方面还从制度的建立上下功夫，如《解放日报》就在内部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1) 编委会的每一个成员分工联系一个党政军领导机关，使党的观念落到实处；2) 建立审查稿件制度，规定重要社论、消息、通讯、文章由党中央审定；3) 建立检查报纸制度，实行领导人看大样制度。从此后，一套完整的事前检查制度就逐渐形成了，而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对事前检查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看，事前检查制度是不利于思想的起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的。

注释：

[1]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后所引陆定一的观点，未注明出处者，皆见此文。

[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2-523页。

[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797-802页。

[4]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台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3页。

[5] 毛泽东语，见《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

[6] 《致读者——〈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

[7] 黄昌勇编：《王实味 野百合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8] 党中央规定了22个学习文件，其中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这22个文件，对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对于扫除教条主义的迷雾、认清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源，对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于增强党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

[9] 根据丁淦林先生的梳理，我国的党报理论有如下基本有发展线索，即建党时期强调指导性——长征时期注重组织性——延安时期主要讲党性——1956、1957年讲政治家办报——1989年以后则重于舆论导向。我认为丁淦林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我们党报理论的发展以及每一时期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内驱力是什么？当然明显的一点是党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但除了政治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因素，譬如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而新闻事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事业，它自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那么这种内在的发展规律在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作用的呢？依笔者个人的观点看，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传播观念的演进应该有三种最主要的作用力，或者说内驱力。其一为

政治的力量，或者说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驱动；其二为经济的力量，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需要经济的支持，没有经济支持的传播组织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当然更谈不上发展了。因此求利就成了传播组织必须看重的一种内存的张力；其三为职业理想，人是一种有目的的生物，而一种组织的出现当然更有其基本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的追求可能在有些时候并没有得到彰显，但一旦其它的作用力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之下时，对于理想的追求便会突显出来。新闻传播组织当然有其职业的理想与职业的追求，这一基本的内驱力正决定了此组织之为新闻传播组织而不是其它什么组织的根本所在。

[10]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5页。

[11] 转引自盛沛林：陆定一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贡献，载《新闻爱好者》1996年第10期。

[1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63页。

[13] 甘惜分主编：《新闻为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4] 陆定一：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

[15] 盛沛林：陆定一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贡献，载《新闻爱好者》1996年第10期。

[16] 童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17] 参见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1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0页。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7—518页。

[20] 也许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对于报纸功能方面的论述见不到，或者是因为马恩的东西对于中国革命不实用？反正当时党内流行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这从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一个专栏可见一般，在这个专栏中刊登了“列宁论党报”、“真理报介绍”、“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等方面的内容，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却没有一点介绍。我认真翻阅了整风时期的《解放日报》，发现当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鲜有介绍和论述。

[21]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创作的杂文集，分两次刊发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文艺》副刊上。

[22] 见1942年《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

[23] 见博古：《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1944年）

[24] 参见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责任编辑：）

收藏本文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1615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会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 返回首页

传媒资讯网 | 传媒学术网 | 传媒考研网 | 传媒博客 | 传媒社区 | 传媒书店

！ 关于我们 ！ 会员注册 ！ 交换链接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